国务院日前发布《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》，指出要在公共服务、资源环境、基础设施等七大重点领域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，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。专家认为，随着社会资本可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开放，要确保民间投资留得住、能受益，就必须创新投融资机制，为社会资本提供长效稳定的盈利机制。

七大领域扩大开放 破除垄断利益共享

激活社会投资要有盈利机制

本报记者 周小苑

商海春作（新华社发）

对社会资本发请柬

近年来，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的背景下，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发力。继民间投资新36条和42项细则打破民间投资的藩篱后，国务院今年加大力度开放铁路、机场、电力等众多重点基建领域，社会资本进入垄断基础行业的路径和制度设计已逐渐清晰。

在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看来，此次《意见》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，提出了进一步创新生态环保投资运营机制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农业和水利工程、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、改革完善交通投融资机制、鼓励社会资本加强能源设施投资、推进信息和民用空间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、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社会事业投资力度等7个方面的重大措施。这些措施将有效降低相关领域的进入门槛，为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“鼓励社会资本投入，是此次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重要特点。”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巡视员欧鸿表示，这七大重点领域大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，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发展还不够充分，进入还存在一定的障碍。因此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，坚持以社会资本为主和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的原则，让社会资本发挥重要作用。

稳增长的长效之策

在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，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壁垒，引入社会资本之“活水”，对中国经济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。

“此举最首要的目的就是稳增长。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表示，民间资本的进入将起到杠杆的作用，银行资金可以与它相配套，灵活利用BOT（建设-经营-转让）、PE（私募股权投资）等形式，尽可能和资本市场对接。将来也可以通过发债融资、银团贷款等多层次多样性的融资形式，满足实体经济对货币资金的需求。

社科院财经院经济发展战略专家吕风勇认为，这一指导意见既有扩大内需投资力度、稳定经济的涵义，又能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，通过打破垄断引入民间资本而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多渠道激活民间投资的过程，如果能够形成民间资本进入垄断基础行业和薄弱环节的机制，从长期看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、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均大有裨益。

要让民资有合理回报

在逐步打破民资进入重点领域的“玻璃门”后，如何确保社会资本留得住、能受益就成为这些政策措施能否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。

“重大工程中，有的经济效益比较低、社会资本积极性不高，有的垄断性比较强、社会资本想投而投不了。”欧鸿说，要让社会资本发挥重要作用，必须依靠改革，其核心就是解决好三个问题：一是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；二是创新投融资方式；三是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预期。

对此，《意见》明确提出，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机制，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。徐洪才表示，PPP是把民营资本和公共资本相结合的，利益共享、风险分担的机制，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并有成功经验的新型投融资的模式。政府要加大推行力度，引导资金合理流动，对民营资本未来的投资回报产生稳定预期。如果没有稳定预期，就会让民间投资裹足不前，不敢投资。

“由于许多公共事业、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、利润薄，甚至短期内不能见效，因此应当建立补偿机制。”徐洪才表示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形式让参与者有合理的投资回报。“羊毛出在猪身上”，换种思路来创新投融资方式。比如一些铁路建设可能是亏损的公益项目，但铁路沿线站点的商业土地开发是盈利的项目，政府可以通过“以丰补欠”，合理利用这部分资源。

声音

●体制增效应是企业发展理念

目前国有企业的困难，主要是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，出现在中国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中，因此传统重工业经历转型阵痛是在所难免的。这也要求企业的经济结构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，把体制增效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，陆续贯穿到事业当中，提高企业人力成本，让创新对整个企业有一定的贡献。

—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**王远鸿**认为。

●别让户籍制度制约城镇化推进

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，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，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围绕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，其带来改革效应，可谓一石三鸟，既能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社会保障，直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；也让农民工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型，提高了生产率，并且让农民工就业更充分、社会保障更充分，从而让他们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，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**蔡昉**表示。

●保持创新才能有真正竞争力

产品精细度达到极致，小产品都能做到世界领先。为了鼓励中小企业技术革新，江苏制定了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产品认定办法，50个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产品中，有32个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，14个产品填补国内相关领域产业化空白。不断保持创新的态度，才能有真正打不垮的竞争力。

——江苏省经信委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处处长**余雷**说。 （宦 佳辑）

全国人均持有3.5张银行卡

据新华社北京电（记者**刘铮、王培伟**）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截至今年三季度末，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47.46亿张，环比增长4.55%，人均持有银行卡3.5张。

央行发布的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报告指出，三季度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153.82亿笔，金额112.66万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26.36%和4.25%。

银行卡消费增长显著。报告显示，三季度我国银行卡消费业务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4.91%和30.66%；银行卡渗透率达47.71%，与上季度基本持平；银行卡人均消费金额达7976.91元，同比增长30.83%；银行卡卡均消费金额为2277.54元，同比增长9.18%。

网安产业国内企业占主导

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（记者**尹婕**）正值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产业日之际，2015年“4·29首都网络安全日”网络与信息安全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此间举行。北京网络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秦瑞表示，该博览会将通过对互联网安全厂商的产品进行分类评估、综合评价、集中展示，激励企业创新，优化产业结构，进一步强化管理部门对互联网安全产品的审核监管，发挥网络科技对经济繁荣的引擎作用。

据介绍，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由国内厂商主导的新兴产业，国内生产服务商拥有约60%的市场份额。随着政府和社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，以及未来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应用，这一份额还将扩大。

江口“微银行”服务乡村

近年来，农行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支行大力推行银行卡助农取款“村村通”工程，探索“社保+农行+代办点+适龄农户”四位一体的金融服务模式，搭建起27个新农保代办点和70余个惠农取款服务点，行政村实现全覆盖。图为村民在江口县太平镇寨沙侗寨的农行惠农支付点购买日用品。

梁志强摄（**新华社**发）

巨无霸集装箱船首航大连

11月26日，目前投入运营的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“美腾·马士基”轮成功首航大连港。该船进行装卸5000余标准箱作业量后于11月27日早离港。这艘集装箱船舶服务于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班轮公司马士基航运，长400米，宽59米，高73米，吃水16米，载重194916吨，满载可装18300标准箱，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足球场，船高相当于20层楼高。

新华社发

营造公平税收环境 调查遵循国际惯例

反避税不会误伤正当投资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空有GDP 税收流海外

“避税与偷税漏税是不同的，”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本报记者说，避税是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，滥用法律形式，谋求不正当的减轻税负的行为，反避税则是指国家采取积极措施，对避税行为加以防范和制止。转让定价，资本弱化等都是常见的一些避税行为，会造成通常说的“空有GDP，税收不见了”等不正常现象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，一些更隐蔽、更专业的避税手段也经常让人眼花缭乱、防不胜防。

杨志勇认为，避税虽然不违法，但纳税人为少缴税而采取的一些举措与税收立法精神相违背，这些“投机取巧”的行为，一方面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减少，另一方面也对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跨国公司中，“长亏不倒”现象非常常见，一方面是外商不断投资、增资，不断新设企业或拓展生产经营，一方面是持续亏损，却乐此不疲。尽管亏损原因多种多样，但外商运用各种手法降低应税收入、转移应税利润等进行避税，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虚亏实盈、长亏不倒企业的大量存在，侵蚀了我国税基，造成了税收流失。

“由利润转移而产生的税源转移给所在国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，既损害国家税收权益，又增加社会发展负担。”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廖体忠分析指出，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过程中，必然产生环境污染和劳动者保障等长远的社会问题，这些都需要政府公共财政解决。但现实情况是，很多跨国企业在当地只贡献了名义上的GDP、就业，税收却流向了海外，一旦外资撤离，将给当地未来发展留下沉重负担。

根据G20峰会领导人声明，已就到2015年年底完成共同对抗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计划实施达成共识。这对中国而言，意味着通过全面加入国际反避税行动，将提升反避税水平，力堵跨国公司的避税通道。

作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国，中国近年来不断筑牢反避税篱笆。这是否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？对此，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表示，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并非中国独有，通过加大反避税的国际合作，有利于实现更公平的税收征管，不会对那些遵章守法的跨国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

反避税是世界难题

杨志勇介绍说，中国的反避税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。2008年，中国开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，规定了“特别纳税调整”条款，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的反避税立法。其中不仅包括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，还借鉴国际经验，首次引入了资本弱化、受控外国企业等规定。

近些年，中国反避税工作不断加强，统计显示，2005年中国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仅为4.6亿元，2013年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达468.6亿元，累计增幅达100倍。2005年，中国反避税调查平均个案补税金额仅127万元，没有一起亿元以上的案件。到2013年，平均个案补税金额达到2177万元，补税金额过亿元的案件达到10起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并非中国独有，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。在国际上，反避税同样也是一个热门话题，总体来讲，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重视反避税工作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各国更是纷纷加大了针对跨境税源的税收管理力度，国家之间的税源竞争日趋激烈。

杨志勇指出，跨国企业利用各国税制差异，在居民国和所得来源国均将应纳税额降至最低，造成对各国税基的侵蚀，在国际上也是人人喊打的，因此，我们看到，世界各国纷纷引入或升级一般反避税规则，加大了对各类避税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
针对少数违规企业

中国作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国，不断加大反避税力度，是否会影响到外国投资呢？

杨志勇认为，在数量巨大的外资企业中，绝大多数是守法经营的，也能够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公平合理原则处理与中国的税收利益关系。但是，也有少数企业在企业财务税收上进行刻意筹划，规避在中国的纳税义务，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。我们的反避税工作，针对的就是那些少数“不守规矩”的企业，而且在纳税调整的方式方法上遵循了国际惯例。

“因此，对极少数有避税嫌疑的企业开展反避税调查，不仅不会影响招商引资，而且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，有利于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。”杨志勇说。

市场观察